

# 對移民的教育：關於十九世紀末 澳門教育的講話

*Rui Simões\**

## 引言

本文旨在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五年澳門的教學狀況，尤其是澳門土生葡人的教學做一些說明。教育工程的開展，是澳門社會生活中各位主要名流提倡的結果，其中多數是土生葡人，同時也是政治生活中上層人士交談的結果，這些人往往也是社會名流，或者屬同一世家。首先，要考慮在哪些情況下可能出現這些人的擔憂，以及這些計劃有哪些目的。現在雖然不去爭論土生葡人的範疇，因為這些建議的倡議者<sup>①</sup>以前不加區別地把土生葡人稱謂澳門人，或澳門的葡萄牙人，但是要指出這種概念的歷史性，無論對於葡萄牙人和中國人，還是對於土生葡人本身，澳門居民的“外表”不會永遠是一致的。

現在的問題，不是去爭論到底真正施行了哪些教育措施和哪些教育政策，因為這些措施和政策首先反映出同現存教育機構以及澳門地區和政治生活中起主導作用的某些組織，如教會、市政廳和政府的關係。但是，在十九世紀中葉，澳門居民的政治生活和結社活動活躍，即尋求專門的培訓（同時也形成團體），和報紙的普及，報紙是澳門地區壓力團體的論壇和舞台。

---

\* 澳門大學葡文學院。

①這裏我們避免以往那樣用絕對的語言去爭論澳門的起源和劃定（見 Batalha，1974；Teixeira，1965；Amaro，1988；Lessa，1974）。

## 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澳門社會經濟環境

1842年香港讓給英國人後，澳門仍保持着各種收入的來源。這些來源一般有利於整個澳門地區，尤其有利於管理這些收入的行政機關。販賣苦力、鴉片的加工和經營，以及西部沿江的全面商業化，儘管仍處在同香港港口的競爭階段，統統以博彩為歸宿（彩票發售專利）。

1875年，衰落的苦力買賣宣告結束。1876年，由於廣州和北海<sup>②</sup>的先後開放，澳門失去在西部沿江港務活動中所享有的優越地位。1885年，中國最終打破了對博彩的壟斷，1887年成立了紅灣海關，阻止了鴉片走私；這時，印度和錫蘭的茶同中國茶的市場通過澳門展開競爭；這時由於法國佔優勢，澳門與東京灣的貿易也衰落了；與此同時，澳門港<sup>③</sup>逐漸淤塞，使澳門的商業活動更加衰落。

居住在澳門的英國商人和一部份中國商人移居香港<sup>④</sup>，也許是因為澳門的誘惑力消失，或者是因為這裏沒有一套有組織的金融架構<sup>⑤</sup>，沒有會計人員和會計制度足以承擔銀行和保險業務。現有的人員，尤其是葡萄牙來的人員，都在政府部門工作，致力於徵稅和財政監督規定，沒有條件參予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的競爭。

當時所發生的這些變化，使澳門居民首當其衝，他們的生活水平受到影響<sup>⑥</sup>；另一方面，剩下的一點資本逐漸投資到香港的企業<sup>⑦</sup>，面對英國的殖民地，澳門的經濟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衰落。

---

②見“澳門的未來”，刊載於《澳門回聲報》，1894年1月9日（26），第1頁（抄自紅灣海關官員A. E. Hispisey在香港電報局的報告）。

③“澳門港海員的大量減少是澳門處在蕭條時期的另一徵兆。1867年到1878年，海員減少43%，在澳門半島普查的中國人減少17%”。PINTO, C. L.，澳門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刊登在《葡萄牙——亞洲的研究雜誌》，（1）92年9月，72頁。

④“澳門的生命力，保留地方積極性的必要性，根據當地的傳說，當香港讓給英國人後，居住在澳門並在此經商的英國籍商人在把他們的家庭和商業基地遷往香港的時候，曾經預見說過不到幾年，廢墟和荒蕪將使這座城市搭滿帳篷，這個城市將僅僅供漁民晒網，他們把簡陋的房舍，甚至海灘變成自己的家”。《澳門回聲報》1893年7月25日（2），第1頁。

⑤“本地的商人斷言，由於沒有銀行預付入港帆船的貨物費用，引起強烈反對澳門的貿易。與此同時，在香港已具備這種方便條件”。《澳門回聲報》，1894年1月9日（26），第1頁。

⑥“公務人員、律師和神父，這是些開放的職業（……）商業和工業對土生葡人封閉，因為從事這方面活動的中國人只接收他們的同胞為股東或僱工。兩個對手中當其中一個能夠生存並能以不到另一個一半的價格生產有用的產品時，兩者之間就不可能存在技巧和手藝的鬥爭”。《澳門回聲報》，1893年9月26日（11），第1-2頁。

⑦正如這個時期的決算報告所說，協會和機關創收和積累的大部份錢都用於當地不動產的投資。

## 移民的思想

當時的經濟形勢，在土生葡人⑧中間引起日益上升的移民潮，打算走的人不願和定居下來的中國商人競爭。由於指控葡萄牙人在公務員階層中享有優先權，結果是難以在政府部門⑨中找到職業。

澳門土生葡人的識字程度平均超過來自葡國本土的葡萄牙人，但只有少數具有中學水平，而具有大學水平的人，更是屈指可數了。1878年，澳門葡萄牙人識字程度高，顯示了澳門的都市化特徵和第三產業特徵，又說明婦女受教育的特徵。約百分之九十與第三產業有關（……）葡萄牙出生的葡萄牙人的文盲比例之所以很高，是因為在澳門服役的葡萄牙士兵多數來自農村⑩。1896年的人口普查證明，葡萄牙人人數增加，由百分之四十八增加到百分之八十，而澳門出生的葡人（十歲以上）受教育的，由百分之七十四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二<sup>(11)</sup>。

這樣，基礎教育之後，由於缺乏專業訓練，就形成了一種沒有專門技能的勞動力，他們雖然可以投入服務行業，但是因學歷淺在勞動市場上無法進行競爭。這部份人中大多數移居國外，是澳門土生葡人中的青年，他們移居到一些港口，佔據那裏中間階層的地位，前景可觀<sup>(12)</sup>。這種移居國外的潮流，對澳門的經濟<sup>(13)</sup>日益顯得重要，因為移居國外的人和他們在澳門的家屬之間保持了互相支持和同類同種的關係。這種關係的基礎，是新生的社會潮流。移民潮在土生葡人中翻騰

---

⑧參看 Pinto, 《葡萄牙——亞洲的研究雜誌》，(1), 92年9月, 第74頁: “1896年, 在香港10%以上的非華人居民是土生葡人的前輩。開始了依屬的時期”。考慮到在香港普查的非華人為12,709, 在澳門為3,998, 我們得出, 定居在這塊英國殖民地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澳門土生葡人。

⑨“從不太久遠的時代開始, 在澳門就建立了一種政治制度, 即反對由於公務員的死亡或改革而造成的空缺讓給那些從葡萄牙本土來的人。在這場鬥爭中, 勝利者幾乎常常是從葡萄牙來的人, 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比澳門人更有能力擔任這些職務, 而是任人唯親和庇護同黨”。《澳門回聲報》, 1893年11月28日(20), 第2頁; 1903年, Luiz Nolasco在一封發自科英布拉的信中對這種思想作了肯定的回答: “澳門人本身也應改變觀念: 公務似乎是他們的理想; 必須對他們說, 這種理想是非常狹隘的。無論在葡萄牙還是在澳門, 都存在同樣的病態; 似乎在預算桌子以外, 就找不到飯吃(……)我的土地上的小伙子們! 你們要毫無例外地準備好在澳門內外謀生, 不要等待中央政府留給你們的麵包屑”。《愛國者》, 1903年5月13日, 第1頁。

⑩見 Pinto, 《葡萄牙——亞洲的研究雜誌》, (1) 92年9月, 第81頁。

<sup>(12)</sup> “因此, 只有在澳門以外, 在那些歐洲人定居的遠東國家裏, 澳門土生葡人作為歐洲人開拓商業和工業的助手, 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遼闊富饒的東方國家裏, 工業發展的前景廣闊燦爛。但是, 要成為歐洲人的助手, 培養澳門的子女的方式必須使得他們在這些國家受到僱傭, 工作得到賞識”。《澳門回聲報》, 1893年9月26日(11), 第1-2頁。

<sup>(13)</sup> “不久以後, 廣東的大生產中心便通過蒸汽船隻與沿海建立快速的來往。而澳門由於地處其中一些大生產中心的附近, 便從這些商業活動的增長中不斷地得到好處(……)據我們的計算, 以總部設在香港的各個公司和企業的股息、銀行存款利息、居住在澳門的房東房租和店員每月給其親戚匯款等形式, 從香港每年滙到澳門的款超過十萬澳門幣”。《澳門人報》, 1889年7月27日, (1, 1, 11), 第1頁。

，並且流向香港以外的其他亞洲港口：上海、廣州、神戶、新加坡等。成立的各種僑民團體努力工作，以確保葡萄牙領事館的代表權，保護個人的利益和僑民參與企業的利益。與此同時，開展文化活動，以確認僑民作為葡萄牙文化喜愛者的特殊地位，而這種文化有時與葡萄牙本土的文化相距遙遠，尤其是對第二代而言，他們不常用、甚至基本不用葡萄牙語。

澳門土生葡人的身份之所以難以確定，除了因為他們與歐洲人和中國人有共同的地位外，還由於各種不同的屬性，如祖先混血、應用多種語言和信仰天主教等而形成的中間地位；對於中國人和對於澳門的葡萄牙人來說，澳門的土生葡人都比較接近本土的葡萄牙人，但是他們感到自己被拋到二等公民的地位，例如在就業機會方面。

澳門土生葡人人口猛增，與混血家庭這個特點有關：澳門土生可以是非澳門人的子女，因此澳門土生無法僅僅根據現有的家庭<sup>(4)</sup>來控制人口的增長。例如，葡萄牙軍人和中國姑娘之間的通婚增大了土生人口，但是，土生社會不能通過家庭關係吸納和教育這些子女<sup>(5)</sup>土生社會的統一和凝聚因素，主要是通過教會的組織，使前面提到的各種屬性最終歸宿於天主教。

我們找到一篇有關移民過程的演講，其基本思想有三點：a) 由於隣近地區的經濟發展造成移民的不可避免性；b) 為保證移民具備競爭的基本知識，要對他們進行教育；c) 要保持各批移民之間保持聯絡。倘若移民他國是一種深刻的結構性需要，演講者的觀點應該會流傳下去，而且可能會流傳到今天。在這些有關教育的演講內所貫穿的基本思想有助於形成超越澳門本土的國際性澳門土生葡人社會。

## 思考教育

歐洲發生的變化反映在有關教育的官方講話裏，和部份的法律；三個可變因素反映到教育方案內：1) 教育學理論把教學集中到兒童身上；2) 對中學教學和世俗中學的教學實行普及；3) 主張女性受中等教育。關於婦女教育的演講反映出各界的情緒：1887年，《信徒之聲報》說：“上帝把媽媽安排成其子女的天生教育者，教育他們以後成為國家的公民”，在隨後的一期又說：“順便說一句，婦女出生不是為了當博士，而是為了製造家庭的歡樂”<sup>(6)</sup>；前面已引用過Antonio Joaquim Basto（巴斯托）1893年所提出的建議，在這些建議裏，婦

---

(4)由於不清楚這個時期對澳門社會內部等級劃分所進行的任何研究，這裏只能按照屬於所謂“古老”的家庭，或者屬於第一代或第二代人的標準，指出澳門土生葡人中間存在的明顯等級。

(5)“近年來黑人士兵大量在澳門結婚，建立許多家庭，由於缺乏生活的資料，他們的後代一旦拋棄自己的身份，前途就非常不幸；因此，要麼對他們進行救濟，要麼抑制這些增長的趨勢”。《澳門回聲報》，1893年9月26日（11），第1-2頁。

(6)《信徒之聲報》，1887年5月3日（13），第72到73頁和3月12日（13）第80頁。

女的相對價值尤為明顯：“市政廳計劃為女子創辦一所中心學校，學校的組織結構幾乎與男子學校的結構完全一樣，希望以此為男女建立同樣的智力水準，是男女兩性之間互相尊重的最可靠保證”

如前面所說，土生葡人中一些社會名流<sup>(17)</sup>也就是一些經濟困難較小的人，在當時的葡語報刊上對教育做出過明顯反思。另一方面，不論是由於威望還是熱心，他們經常地參加社團活動（例如土生葡人教育促進會），他們在市政廳內擔任職務，以及他們在政府部門中，尤其是在中國人的辦事處身負要職<sup>(18)</sup>，導致他們認識到真正掌握漢語的重要性。

巴斯托認為學生有必要熟悉英語<sup>(19)</sup>、漢語（口語和書面語）和法語。他說：“在東方出生、生活和必然在東方壽終正寢的土生葡人，要想不孤立，要想和周圍的許多國家交際，就必須學會多種語言。倘若在中心學校裏開設一個正規的漢語班，在《土生葡人教育促進會》的協助下，土生葡人可以到這裏學習漢語的口語和書面語。為了實際運用漢語，我們開辦了一所商業學校。在這所學府內，相信有一天會增設法語的實際課程，因為隨着法國殖民地的擴大，法語的重要性明顯增長”<sup>(20)</sup>。葡萄牙語失去了與國外勞動市場相聯繫的工具的地位，但是它仍具有“熟悉我們的語言是為更好地理解教師的課文和教科書”的意義。理解教師的課文和教科書僅僅是初等教育起碼的一項目的。

土生葡人移居到亞洲各個港口，有利於在澳門的家庭和集居在各個港口的家庭之間保持聯繫。兩地的消息經常刊登在澳門報紙上，聯絡的環節是葡萄牙語，隨後，從移民的第二代開始，還使用英語。因此，出現了一種看法：在保證土生葡人團結的文化中，葡萄牙語應該是主要因素。

在非公共場合，澳門的葡萄牙人顯示出多元的語言才能。葡萄牙語、土話及口頭的廣東話摻雜使用，摻雜的程度依照各個家庭的社會、文化水平，以及性別而異，十九世紀末，有語言純正癖的人認為對葡萄牙語的摻雜是對掌握該語言的威脅。因此，土話遭受到一些患有語言純正癖者的嚴重打擊。

澳門土生葡人教育促進會成立於1871年，是土生葡人通過社團力量企圖振興教育的突出事例。1878年，創辦了商業學校，但是竭力同神學院<sup>(21)</sup>商洽，後來又

---

(17)即 Nolasco, Remedios, Basto, Batalha, Jorge, Silva, Assuncao和 Senna Fernandes 家族。

(18)多年來，這是允許澳門土生葡人擔任最高領導人的唯一行政管理機構。

(19)只要有可能，就用英語為母語的教師，或居住在操英語的領土的人為教師來填補英語教學的空缺以及即時填補會計的缺額；如 Hart Milner, William Pereira, Hambling 和 Hornsby及 Arkwright 神父，都在商業學校教過書。由於他們的收入遠遠高於其他教師，所以他們不輕易離開。看溫德泉神父《澳門的教育》，澳門，教育文化廳，1982年。

(20)見《澳門回聲報》，1893年9月12日（9），“市政廳長的講話”。

(21)從1872年起，同意澳門土生葡人教育促進會對神學院技術教學的金錢資助：“最近經研究委員會的同意，設置商業帳目的課程，必須學習下列材料：1、數學；2、簿記；3、銀行業務（此外，還必須學習講寫廣東話和普通話）見《澳門和帝汶島省的通報》，1872年8月31日（18.36），第158頁。

同澳門中學商洽，以便成立商業學院，“目的在於成立商業班的第二科”<sup>(22)</sup>；由於清楚地意識到在教學體制內可以選擇提出第二種課程的必要性，尤其在模擬一個學生的經歷方面，希望早日辦澳門中學：“假設中心學校已組建完畢，讓我們看看一個學生的學校生活將是什麼樣子：一個六歲的孩子進入中心學校後，如果留級蹲班，必須在學校裏生活四年或五年。十歲或十一歲進入中學。一般來說，中學學制為四年，但是倘若學生要學文科或理科，學制為六年。這樣，顯然一個學生十四或十五歲時方可完成中學的一般課程，才能從事商業生涯，或尋找其他的文職性的工作；到十六或十七歲時，才有能力到葡萄牙去攻讀任何自由的專業”<sup>(23)</sup>。

澳門中學創建於1893年，1894年開學。對於葡人社會來講，這所學校的創辦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不僅僅涉及到培養學生的可能性（最初幾年，澳門中學的學生人數有限，而且多數是本土葡萄牙人的子女），無論對來自葡國本土的人還是澳門的土生葡人，都需平等對待，抹掉了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本土人打上<sup>(24)</sup>的殖民地等級制的標記。另一方面，某些家庭（即經濟狀況較好的家庭）在尋找同葡萄牙<sup>(25)</sup>類似的教學大綱，以便保證他們子女能夠升學，澳門中學的創建也符合這種期望。

## 結 語

關於澳門土生葡人教育的一些講話，建立在各種不同需要、權力和目的平衡的基礎上：1）雖然神學院竭力迎合土生葡人的實用主義的需要，但是也看到培養宗教人員的種種需要。2）政府管理的澳門中學，建立在往葡萄牙升學和依照葡萄牙教育方法的基礎上。3）大部份澳門土生葡人追求商業教育和受到多種語言技能的培訓。為此，最有代表性的市政廳以及澳門土生葡人教育促進會共同體現了這種政策。這些不同的部門和不同目的的混合，產生了有關移民教育的各種不同的講話。在十九世紀末澳門經濟走下坡路時，這種教育所追求的目的，是培養一種國際性的群體，這個群體是以葡萄牙人為標誌，不限於澳門本地，而是分散到整個亞洲。

---

(22)見溫德泉神父，《澳門的教育》，澳門：教育文化廳，第89頁。

(23)《澳門回聲報》，1893年9月12日（9），“市政廳長的講話”。

(24)請注意結社運動初期所顯露出的精英主義傾向：除個別情況外，軍人工會（後改名為軍人俱樂部）實際上只接收葡萄牙本土的軍人，把會員的地位規定為公務人員中最高級的官員和軍官。

(25)“某些家庭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從事某種自由職業，或者進入軍界，或者盼望子女成為高官，所以希望其子女在澳門進行的學習研究能在葡萄牙有效，以便有助於他們被錄取到科英布拉大學葡萄牙的其他高等學府內。他們為此奔波，以便在澳門能有一所與里斯本和波爾圖中學對等的中學，目的在於使其子女受到正統的中等教育。/《澳門人報》，1886年9月30日（17.5），第65頁。在討論規則的過程中，連澳門中學的教師都認為任何的學歷都適合澳門：“〔第9條〕澳門中學的各科教學，要對葡萄牙各所中學現行教學大綱中規定的各種教材進行研究”。（見澳門國立中學，《學校委員會會議紀要》1894年7月14日）。

## 參考書目

- # AMARO, Ana Maria , 《大地之子》, 澳門: 澳門文化學會, 1988。
- # AZEVEDO, Rafael Avila de, 《葡萄牙文化在澳門的影響》, 里斯本: I CALP, 1984。
- # BATALHA, Graciete , 《澳門的語言: 從前和現在》, 澳門: CIT, 1974。
- # CREMER, R. D. (出版者), 《澳門: 商業和文化的城市》, 香港: UEA Press, 1987。
- # 教育司, 《澳門的教育機構》, 澳門: 教育司, 1988。
- # 葡語教學研討會(第一屆), 澳門: 東方葡萄牙學會 - 澳門教育司。1987。
- # 澳門商學院組織法, 澳門: Typographia Noronha, 1901。
- # LESSA, A , 《東方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歷史和人民》, 澳門: 政府印刷署, 1974。
- # MONTALTO DE JESUS, C. A , 《歷史上的澳門》, 澳門: Livros de Oriente, 1990。
- # PINTO, Carlos L. , “澳門第一次人口普查”, 載於《葡亞研究雜誌》, 澳門: 1992(1): 71 - 82。
- # 潘日明神父, “澳門的教育和解決其問題的計劃”, 載於“教會通報”, 澳門: 澳門教區, 79年(918): 48 - 62。
- # SILVA, Joao Jose da, “從發現時期到1882年海外法律的按字母排列和年代表或參考目錄”, 澳門: 聖約瑟修院, 1886。
- # 溫德全神父, 《澳門的教育》, 澳門: 教育文化廳, 1982。
- # 溫德全神父, 《澳門的教團和宗教團體》, 澳門: Tip Soi Sang, 1956 - 1961 (澳門及澳門教區第三卷)。
- # 溫德全神父, 《土生葡人》, 澳門: 政府印刷署, 1965。Mc / 267ml 4 /
- # 溫德全神父, 《澳門中學》, 澳門: 教育司(第三版), 1986。

